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

◇雍涛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教授、博导]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涵义

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是1938年10月毛泽 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 告中提出来的。原文是:"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 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即是 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 亟须解决的问题。"[1]应该说,这个提法是正确的、科 学的。从六中全会到七大这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概念频繁地出现在中央领导人的文章和报告 中。刘少奇在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称毛泽东思想是 "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且向全 党提出了"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任务。[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涵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之发生带有中国特点的变 化,创造出符合中国实际需要,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 派的马克思主义。后来,党为了避免"民族主义"的嫌 疑,改变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建国后出版 的《毛泽东选集》,凡是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 地方,都作了修改或径直删去。《论新阶段》报告的一 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收入《毛选》 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具体化"[3]。"文化大革命"之后,党中央和学术界认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是正确的,应当予以恢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概念最先是由艾思奇等人提出来的,它主要是讲辩证唯物论在中国的现实化和通俗化问题,但但规范性的表述仍然离不开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而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经济领域和社会历史领域的成功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民族所接受、所认同,究其实质来说,就是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中华民族所吸收和运用。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理论基础。

2.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一般涵义之外,还有自己的特殊涵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其他部分的中国化有联系也有区别。它们相同之点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之发生带有中国特点的变化,创造出在内容上、形式上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点是哲学理论的抽象化和普遍化更高,其中国化的过程更加复杂,需要一定的中介。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包含有具体化、民族化、通俗化的特殊涵义。

所谓具体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进行哲学概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 具体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化为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等指导中国革命 和建设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所谓民族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继承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哲学遗产,总结现代中国人民奋斗的经验,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这里讲的民族化,不仅指表现形式,而且包括哲学原理、价值取向、精神风韵等内容。

所谓通俗化,就是用人民群众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原理,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成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实现哲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何必要

有人认为,哲学原理如同数理化公式一样,是不分民族、国界而普遍适用的,没有什么"中国化"、"外国化"的问题。这种观点是似是而非的。要知道,哲学与自然科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在中国发生作用,必须与

本民族的特点相结合,必须经过民族文化的涵化,才 能获得成功。由西方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中国 发生作用,并创造出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 经历许多艰难困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史的 总计、总和,但主要又是西方古希腊以来哲学传统特 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积极扬弃,其概念和范畴、观点 和原理主要体现西方的哲学精神和价值标准,与中国 传统哲学存在一定的差别。例如,在本体论上,马克思 主义哲学注重自然本体的建构,而中国传统哲学则偏 重于政治与人的哲学思考,倾向于本体论与方法论的 直接合一;在认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着力于逻 辑方法、思维规律的精研发微,而中国传统哲学则偏 重于认识过程的宏观把握、知行关系的一般探讨;在 辩证法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具 有冲突论的西方文化的传统,而中国传统哲学则偏向 于和谐统一,体现出中华和合文化精神。如此等等。因 此承认这种差别就必然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中国 化的必要,即中华民族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不能 不根据自己的实践要求、社会背景、文化传统有对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进行消化、吸收和取舍的必要。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不断创新,才能为当前的 政治服务的角度来看,也必须使之中国化。毛泽东说 过:任何哲学都是为当前政治服务的。资产阶级哲学 也是为当前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候都 要有新的理论家,写出新的理论来为他们当前的政治 服务。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更要密切为当 前的政治服务。因此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 的无产阶级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 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社会在 不断发展,而各国国情又千差万别,所以任何国家、任 何时候单靠老的东西是不行的。单有马克思、恩格斯 哲学,没有列宁哲学就不能解决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产 生的新问题;单有列宁哲学,没有《实践论》、《矛盾论》 这样的中国哲学,同样不能解决中国革命出现的新问 题,不能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5]所以,马克思主义哲 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也是时代的 需要,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

2.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所以可能,首先是因为中国社会有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客观需要。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6]毛泽东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时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7]对中国近代社会矛盾的分析和解决,要求有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指导。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

苦,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进化论和心物二元论的宇宙观,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方案等等,都试验过了,都失败了。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则终于使中国人民找到了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于是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用它来观察国家命运,分析社会矛盾,得出"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接着是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思想体系所具有的科学认识功能,是无产阶级寻找思想武器并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根据。

其次从文化传播的交流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 文化现象同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或 一致性。例如,从本体论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 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而物质又是在时空中有规律运 动着的,人们的思想、观念只能从现实的物质条件出 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这种观点可以用"天行有 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观点 来理解。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还有不重生死、不信 鬼神的无神论倾向,也使人们比较容易否定唯心论和 有神论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在辩证法方面,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辩证思维的民族,朴素直观的辩 证法观念在中国的发展,无论就其历史的悠久性还是 就其观念本身发展的成熟性来说,都达到了举世鲜见 的发达水平,其基本观点表现在阴阳学说与和谐统一 的思想之中。阴阳学说不但初步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 在事物发展中的核心作用,而且也使中国传统思维方 式具有简单对举和二分法的鲜明特点,无论"一两 观"、"两点论"还是兵家辩证法,都是这种辩证思维模 式的产物。这种阴阳学说的传统和对立面简易二分法 的思维模式尽管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具有必然的 同构关系,但由于两者的基本着眼点都在于矛盾双方 的相互关系上,因此比较容易产生思想上的契合,这 样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中国化便有了一定的文化土 壤和根基。在认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辩证 唯物论的认识论,其基本观点是实践第一和认识辩证 发展的观点。中国传统哲学在认识论方面主要是探讨 知行关系问题。无论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都有两个 显著特点:一个是注重习行践履;一个是强调主观能 动性。而这两点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认识辩证发 展理论有着某种相通之处,因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 中国化比较容易推行。在历史观方面,马克思主义的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人类社会存在和 发展的基础,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种观点同"穿衣

吃饭即人伦物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有某些相通之处,它有助于中国人接受唯物史观。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有许多大相径庭的东西,存在着比较复杂的关系,切不可以简单化。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已经有了 60 多年的历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受挫折的教训。其基本的经验教训可以概括如下:

1. 正确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是实现中国化的理论前提

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首先要正确解读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由马克思、 恩格斯共同创立,而由列宁等人所发展,但其基本观 点则体现在他们各个时期的著作即"文本"中。因此只 有通过对其"文本"的认真解读,才能把握其基本观 点、真实内涵和精神实质,并对其做出客观、公正的评 价,了解其所蕴涵的当代意义,肯定其科学价值,超越 其历史局限,建构起新的哲学形态。同时,在解读过程 中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为此需要注意以下 几点:一是坚持客观性立场。要以"文本"为本位,从学 术层面对其学理作出客观公允的解读和评价,尽量避 免从特定的思想构架和政治观点出发,做情绪化的发 挥和评价。二是注意完善准确地理解。不能局限于个 别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观点,而要把他们早期、 中期、晚期的思想联系起来考察:不仅要看到马克思、 恩格斯在哲学研究上的某些分工和差别,更要看到他 们之间的一致性;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只看个 别词句,而要从体系上、精神实质上去获得正确理解, 尤其对范畴、原理要注意它们的适用范围,不能不分 时间、地点、条件到处乱套。三是不仅要解读显性理 论,而且要读出潜在于显性理论中的非显性内涵。显 性层次的东西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资源背景、基 本观点及其变化发展过程,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 他哲学流派的关系等等:非显性层次的东西,诸如马 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远的历史眼光,广纳 人类优秀文化的博大胸襟,以及对人类前途命运的终 极关系等等。显性层次所表征的可能只是露出水面的 巨大冰山上的一角,我们更要从白纸黑字中的表层结 构"读出"蕴涵其中的深层意义。

现在有一种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采取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倾向。例如,有的人仅仅依据由《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构成的文本系列解读马克思,把他的思想诠释为理论实质上的"斗争哲学",社会形态演进中的单线论和

直线论,革命实践中你死我活的专政策略。而另一些人则依据由"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类学笔记"等构成的另一套文本系列,把马克思的思想解读为理论实质上的人道主义思潮,社会发展问题上多元选择论以及渐进式的和平改造策略。其实这些著述都是马克思本人在不同时期写作的,因此只有把它们全部纳入研究视野来考察,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其发展演进的曲折历程。

还有一种倾向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分离开来,对 立起来,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从"人"出发,是人本主义, 他只承认人的辩证法,不承认自然辩证法;恩格斯的 哲学则从"物"出发,是物本主义,他的辩证法只讲自 然辩证法。他们还认为,《反杜林论》哲学篇、《自然辩 证法》关于辩证法三大规律等的论述并不代表马克思 的哲学思想,不能"以恩解马",因而提出"回到马克 思"的口号。这也是未能完整准确地解读马克思主义 哲学文本的表现。其实根据有关文本,马克思主义的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是由马克思和 恩格斯共同创立的。标志唯物史观初步确立的《德意 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作的:《反杜林 论》关于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时间与空间 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方式等世界观 原理、《自然辩证法》关于辩证法三大规律及其他范畴 的论述,都既是恩格斯的思想,又得到了马克思的首 肯和称道。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说:"本书所 阐述的世界观,很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 而只有极少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 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 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 听……。"[8] 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马克思不 仅完全知道,而且十分赞赏。他们之间关于自然辩证 法问题的通信就足以证明。如果不顾这些事实,硬要 把他们研究重点的某些差别加以夸大,使之对立起 来,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2. 批判继承中国哲学遗产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条件

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时就提到总结批判中国文化遗产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条件。他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份珍贵的遗产。他在延安讲课分析当时中国的哲学运动时又指出:要使辩证法唯物论思潮在中国深入与发展下来,并指导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必须树立批判的旗帜,同各种现存的反动哲学作斗争,同时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才能达到目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中国化,如果不同中国优秀的哲学遗产相结合,是"化"不了,也是不牢靠的。而批判改造中国古代哲学遗产,是马

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中介和转换机制。为此,对待中国哲学遗产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针,就是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即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将本民族文化遗产(包括哲学遗产)中至今仍有积极意义的精华部分加以批判改造,使之现代化,成为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当前的现实服务。但在这一个过程中要防止历史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倾向。

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正是批判继承中国 哲学遗产、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实践 论》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认识辩证发展过程的理论 同中国传统哲学中重习行践履和强调主观能动性的 思想结合起来,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和"行"进行 改造,把基本上是个人道德践履的"行",改造为人民 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从深层的文化 机制上实行了"行"向"实践"范畴的现代转型;还把中 国传统哲学中以对道德原则的体认为主要任务的 "知",转化为以"求真"为目的的"认识",赋予"知"以 一般认识论的涵义,并阐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 证关系,强调逻辑和科学抽象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 用,克服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缺乏逻辑分析和科学抽 象的缺陷;更为重要的是提出了认识过程"两个飞跃" 的理论,建构了认识和实践、知和行"具体的历史的统 一"的现代知行合一论,赋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中 华民族的形式,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中国的发展找 到了新的生长点,增添了新的内容。《矛盾论》用马克 思主义辩证法改造了中国传统辩证法的"矛盾"概念 的模糊性,给予它"对立统一"的规定,把"矛盾"的基 本思想——"相反相成",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的"同 一性和斗争性"范畴,阐明了两者的辩证关系;并科学 地阐明了"条件"对矛盾转化的重要性,克服了中国传 统辩证法忽视转化条件的相对主义倾向:更重要的是 《矛盾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原则提出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是矛盾问题的精髓的重要思想,在承认矛盾普遍性的 前提下着重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的诸种情形,建构了 一个分析矛盾特殊性的逻辑体系。这样既克服了中国 传统辩证法的缺陷,又赋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以"中 西合璧的矛盾辩证法"形式,使之在中国的文化土壤 中找到了坚实的生长点而得以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当 然,毛泽东并没有结束真理,充分地利用文化遗产的 任务并没有完结,还有许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就是封建主义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封建化",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就是一种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表达的在结构上十分类似儒家封建文化的思想体系。这种看法是非常错误的,必须

加以澄清。

如前所述,对于封建文化,毛泽东历来采取分析 批判的态度。他说过,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 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 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 的东西区别开来,还要把封建主义上升时期的东西和 没落时期的东西区别开来,要有批判地有区别地加以 利用。针对那种认为儒家的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的不 良传统的思想,他指出孔孟学说有一部分真理。全部 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9]他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 化的过程中正是这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实践 论》、《矛盾论》以及后来他对孔子哲学思想、墨子哲学 思想、董仲舒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批判就是明证。 因此从总体上看,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不是什么封建化、儒家化,而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 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批判改造。当然,不庸讳言,毛泽东 晚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上也有过失误, 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化的倾向,我们应当记取这 个严重教训。

3. 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新体系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标志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目的是要建构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服务。

所谓体系,简单地说就是"概念和理论的系统"[11]。具体地说,一门科学的体系,一般由这样三个部分构成:(1)有关这门科学的最基本的概念和范畴;(2)建立在这些概念和范畴之上的基本原理;(3)同这些原理相联系的其他一些较为具体的理论。

这三个部分又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之间 有着前后一贯的逻辑联系。体系是事物内在联系在人 们思维中的反映,并且随着人们对事物内在联系的认 识的发展而发展,没有一成不变的体系。体系对于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某一科学体 系的创立,实际上标志着人们对某一事物在某一阶段 的内在联系的认识的完成。科学只有当它构成体系的 时候,才能全面地或比较全面地揭示出某一领域的事 物的内在联系,才易于为人们学习、掌握和运用,并在 社会生活中产生广泛的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 之所以能够战胜一切反科学的思潮,之所以能为千百 万人民群众所掌握,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一个 彻底的科学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反对一切反科 学的体系,并且无情地嘲笑和抵制那些动不动就宣称 自己已经建立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思想体系的人,把这 些人看作是吹牛家和骗子。但马克思主义者丝毫不轻 视科学体系的意义。恩格斯在他同杜林论战的著作 《反杜林论》中说:"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 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12]这种内在联系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学理上说,归根到底 就是要建构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创造 新的哲学形态。这个体系的基本要求是:(1)要体现马 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的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及其以 后的发展:(2)要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实 现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汇:(3) 要总结中国革命和建 设的实践经验,应对新时代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 新要求和新挑战,反映当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新 成果,概括出新的范畴、原理;(4)内容要精炼,形式要 生动活泼,体现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在体系问题 上,我们要反对否认体系创新必要性和片面追求所谓 新体系的倾向。毛泽东十分关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体系的建构。1937年他在编写《辩证法唯物论(讲 授提纲)》时就对哲学体系的改造有所考虑。他的这个 提纲,虽然在内容方面基本上取材于苏联 30 年代的 《辩证唯物论教程》、《新哲学大纲》、《辩证唯物论与历 史唯物论》(上册)三本书,但在体系上则有自己的特 点,提纲中"物质论"、"运动论"、"时空论"、"意识论"、 "反映论"、"真理论"、"实践论"等标题,反映出毛泽东 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向。因为中国古代 哲学家就有"齐物论"(《庄子》)、"白马论"(《公孙龙 子》)、"天论"(《荀子》)、"崇有论"(裴颜)、"神灭论" (范缜)等为篇名的传统。以后毛泽东又强调哲学上 "不必抄斯大林",要有中国人自己写的马克思主义哲 学教科书问世:50年代发动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运 动;60年代要求搞哲学的人要深入实际,要把哲学体 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么多,不要 罗列一大堆概念,拼凑一大堆枯燥无味的条文,要写 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他对哲学界的人 士说:"你们搞的是洋哲学,我搞的是土哲学。"他的意 思是要求中国的哲学工作者结合中国实际,在中国文 化的土壤上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要求都是很 好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关于改造哲学体系 的设想没有能够实现。作为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我们 有责任积极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对现有的哲学体 系进行改造,建构起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 系。

现在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是斯大林1938年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应当彻底抛弃,要以"实践唯物主义"为基础,重新建构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我以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斯大林的体系,是把世界观和方法论分割开来,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对立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马克 思主义的辩证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三大块,分别阐述它们的基本特征的 哲学体系。这个体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确实作了 简要地说明,就其内容而言也有不少值得肯定的地 方,在哲学的普及和应用方面也算是作了一件有益的 工作。但总的来说存在不少问题和错误。如没有强调 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没有强调实践 在认识论中的作用:讲辩证法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 讲对立面的统一;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时,把社 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看成"完全适合",没 有矛盾;对20世纪30年代以前自然科学的成果没有 作出哲学概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没有作出合 乎现实需要的引导,等等。所以,斯大林的体系是一个 不成功的体系。事实表明,中国人并没有按照斯大林 的体系写过哲学教科书。应该说,"文革"前以艾思奇 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代表的中国 哲学教科书体系,不是斯大林所表述的体系,而是根 据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体系和毛泽东的《辩证法 唯物论(讲授提纲)》及《实践论》、《矛盾论》的体系建 构的,而它们的最后根据则是马克思的《费尔巴哈提 纲》、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列宁《谈谈 辩证法问题》等著作。现在看来这个体系是有缺点的, 对马克思的哲学"文本"解读不够,对时代精神反映不 够,与实践发展的要求有很大的距离。但我认为不应 当全盘否定,而应当在这个基础上按照上述关于建构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要求加以改进和创 新。

参考文献:

- [1] 晋察冀日报社编. 毛泽东选集(第5卷)[M]. 20-21.
- [2] 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35.
-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 [4] 艾思奇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8.
- [5]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9-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1.
- [7]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5.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47.
- [9] **龚育之,等.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M]. 北京:三联出版社, 1986. 200-201.
- [10]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1.
-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44.